

歷史時期的淇武蘭—— 淇武蘭的出現與漢人移民社會

■ 鄒培姍

本次「勁水國寶：故宮 × 蘭博特展」展出淇武蘭遺址金屬器時代的幾何印紋陶罐、魚形雕板、魚形金屬編物，呈現出淇武蘭遺址史前遺物的豐富及不同媒材的多元性。除了這些當地所生產的珍貴史前遺物，淇武蘭遺址也出土了許多外來陶瓷，並集中出現於北臺灣的兩大貿易高峰——十七及十九世紀。淇武蘭遺址的重要性除了體現在臺灣本地平埔族研究的歷史意義，也見證了臺灣在華人移民社會時代背景及中國陶瓷外銷貿易網絡下的其中一環。本文欲透過淇武蘭這個名詞的出現及遺址中出土外來陶瓷的介紹，讓觀眾更瞭解淇武蘭遺址史前文化以外的其他面貌。

淇武蘭遺址位於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河畔，因河川整治與北宜高速公路跨河工程無意發現，於 2001 年起進行搶救發掘，出土成果豐碩，包含墓葬與豐富的陪葬品、古代的建築遺構、現象灰坑，以及各種人爲的陶瓷器、石器、木器、骨器、金屬器、玻璃、瑪瑙等遺物，加上大量的動、植物等自然遺存。區域內包含淇武蘭和洲仔尾等不同名稱的聚落，考量遺址的地點是直接緊鄰著淇武蘭聚落，故命名爲「淇武蘭遺址」。

本次「勁水國寶：故宮 × 蘭博特展」展出淇武蘭遺址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600-100 年）的幾何印紋陶罐、魚形雕板、魚形金屬編物，呈現出淇武蘭遺址史前遺物的豐富及不同媒材的多元性。作為噶瑪蘭本地生產的典型幾何印紋陶罐（圖 1），從器表殘留的使用煙炆痕跡，顯示它曾被用來烹煮或盛裝物品，可以從中窺探當時蘭陽平原上噶瑪蘭人的生活方式。這種

陶罐雖未上釉，卻能盛水不漏、炊煮不裂，展現了當時人們的工藝智慧。擁有豐沛地下水源的蘭陽平原，獨特的水環境也保存了千百年的木質遺物，淇武蘭遺址發現的第一件木質魚形



圖 1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600 ~ 100 年）幾何印紋陶罐 宜蘭淇武蘭考古遺址出土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圖2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600～100年）
魚形雕板 宜蘭淇武蘭考古遺址出土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圖3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600～100年） 魚形金屬編物 宜蘭淇武蘭考古遺址出土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雕板（圖2），雖然用途不明，可能是作為槓頭使用，但雕刻工藝十分精細，在臺灣考古非常難得。而僅見於墓葬出土的魚形金屬編物（圖3），置於胸前的埋葬方式，更顯示其極具社會地位的價值，是蘭陽平原的重要文化遺物。¹

除了這些當地所生產的珍貴史前遺物，淇武蘭遺址也出土了來自中國、泰國等地的陶瓷器，並集中出現於北臺灣的兩大貿易高峰——十七及十九世紀。這些外來陶瓷的出現，及「淇武蘭」這個名稱的誕生，與當時整個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的時空背景及中國外銷貿易航線的轉向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將先梳理「淇武蘭」名稱出現的脈絡，再透過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大量外來陶瓷，探討當時可能的貿易網絡，並呈現淇武蘭聚落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是如何被認識，以及面對漢人移民的衝擊，原來生活在淇武蘭聚落裡的噶瑪蘭族人如何自處或轉變。

淇武蘭聚落裡的噶瑪蘭人

淇武蘭這個地理空間，從十七世紀以來，陸續以 Kibannoran、期班女懶、奇班宇難、燉魯蘭、奇蘭武蘭等文字形式出現（表一）。透過前輩學者的研究，我們得以瞭解曾經可能生活在現今淇武蘭聚落裡的族群，而這些名詞的演變，除了代表著地名的連續性，也代表著這個聚落的規模與變化。

蘭陽平原自古是噶瑪蘭人的活動區域，平原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村社。關於噶瑪蘭的紀錄最早出現於西班牙文獻，西班牙人稱蘭陽平原為「Cabaran」，且原住民人口密度在當時是全島之冠。1642年荷蘭人擊退西班牙人，噶瑪蘭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統治下淡水集會區最邊陲的部分，並留下數次戶口調查紀錄。1648年，受雇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德國人 Caspar Schmalkalden（1616-1673）完成的這張

表一 荷蘭至日治時期淇武蘭社名演變

作者製表

荷蘭戶口表 西元 1647 年至 1650 年	《臺海使槎錄》 清康熙六十一年 (1722)	《續修臺灣府志》 清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年)	《蠡測匯鈔》 清道光三年 (1823)	《東槎紀略》 清道光九年 (1829)	《噶瑪蘭廳志》 清咸豐二年 (1852)
Kibannoran	期班女懶	奇班宇難	奇班宇難 奇蘭武蘭	奇蘭武蘭	燠魯蘭 (土音番社名) 奇蘭武蘭 (譯正番社名)
公文類纂 (清丈區域) 清光緒十二年 (1886)	田代安定 明治二十八年 (1895)	《臺北州理蕃誌》 明治二十九年 (1896)	伊能嘉矩 明治三十一年 (1898)	公文類纂 (查定區域) 明治三十三年 (1900)	《礁溪庄勢一覽》 昭和八年 (1933)
淇武蘭庄	奇武蘭社	淇武蘭社	奇武蘭社	淇武蘭庄 奇武蘭	淇武蘭

資料來源：本表根據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表一、二蛤仔難三十六社社名演變重新整理增補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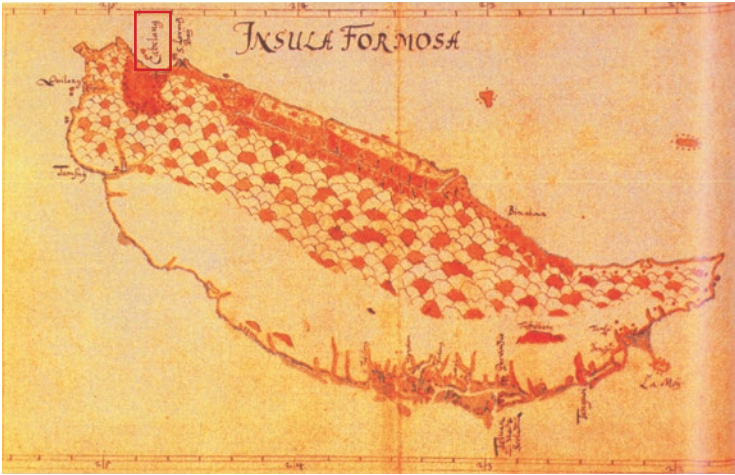


圖 4 1648 年 受雇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德國人 Caspar Schmalkalden 繪製的圖中首次標出「Cabaran」地區 取自陳淑華，《噶瑪蘭族》，頁 48。

噶 瑪 蘭 灣		
Kibannoran	160	840
Kibairier	50	280
Kannabasjen	27	98
Tabbetab	40	201
Kipattobbiaer	58	197
Sasinogan	88	370
Kimaroetenoch	52	231
Patobbican	80	309
Baboelian	29	87
Taradagan	30	113
Tomichoch	38	135
Serrimien	50	217
Kimadipitan	42	185
Kimabalauw Tacobavan	54	260
Saunc	12	67

圖 5 17 世紀蘭陽平原各村落人口與戶數資料 取自陳有貝，《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頁 58。

地圖，首次標出「Cabaran」地區（圖 4）。²而在漢人入墾前，最早完整記錄蘭陽平原噶瑪蘭族村落名稱的是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自西元 1647 年至 1650 年的三次戶口調查資料中，總共紀錄了四十七個平埔社的名稱，其中「Kibannoran」，從地名發音與位置來看，極有

可能就是當時在淇武蘭聚落的噶瑪蘭原住民，該村落計有 160 戶，人口數共 840 名，為當時蘭陽平原最大的原住民聚落（圖 5）。³

鄭氏治臺後，經營重心轉移至臺灣西南地區，噶瑪蘭人逐漸從文獻中消失，直到清代，噶瑪蘭才又開始於文獻中浮現，當時漢人對蘭陽

平原原住民的瞭解，為所謂的「蛤仔難三十六社」。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後，隔年臺灣府首任知府蔣毓英（生卒年不詳）在其編纂的《臺灣府志》一書中指出：「在雞籠鼻頭山東南，有土蕃山朝社，其東南即蛤仔灘三十六社」，此後康熙年間刊行的其他府志便一再抄錄《臺灣府志》的說法，僅有從「蛤仔灘」改成「蛤仔難」，及「哈子難」、「哈仔蘭」等各式音譯的略為差異，如成於清康熙三十一至四十三年間（1692-1704）的《康熙臺灣輿圖》中，亦明確標示「蛤仔灘共參拾陸社在此山後」（圖6），「蛤仔難三十六社」自此之後便成為論及清代蘭陽平原中噶瑪蘭族群的定說，其中大約有二十六個社名能夠跟荷蘭

時期的番社戶口表相比對。不過「社」除了指稱具體的單一聚落，也是清代臺灣稅餉的單位，實際上蘭陽平原的原住民村社是否為三十六社我們也無法確定。⁴

而最早記錄噶瑪蘭族中各別社名的清代文獻，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由奉派為首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黃叔璥（1680-1757）所著的《臺海使槎錄》，全書詳實紀錄十八世紀初期臺灣原住民的風土民情，是研究臺灣平埔原住民的重要史料。當中〈番俗六考〉一章沿襲了「蛤仔難三十六社」的說法，並說明其中的三十二社名可以確認屬於「蛤仔難三十六社」無誤，其餘四社，則無法確定；而確定為「蛤仔難三十六社」之一的「期班女懶社」，即為今日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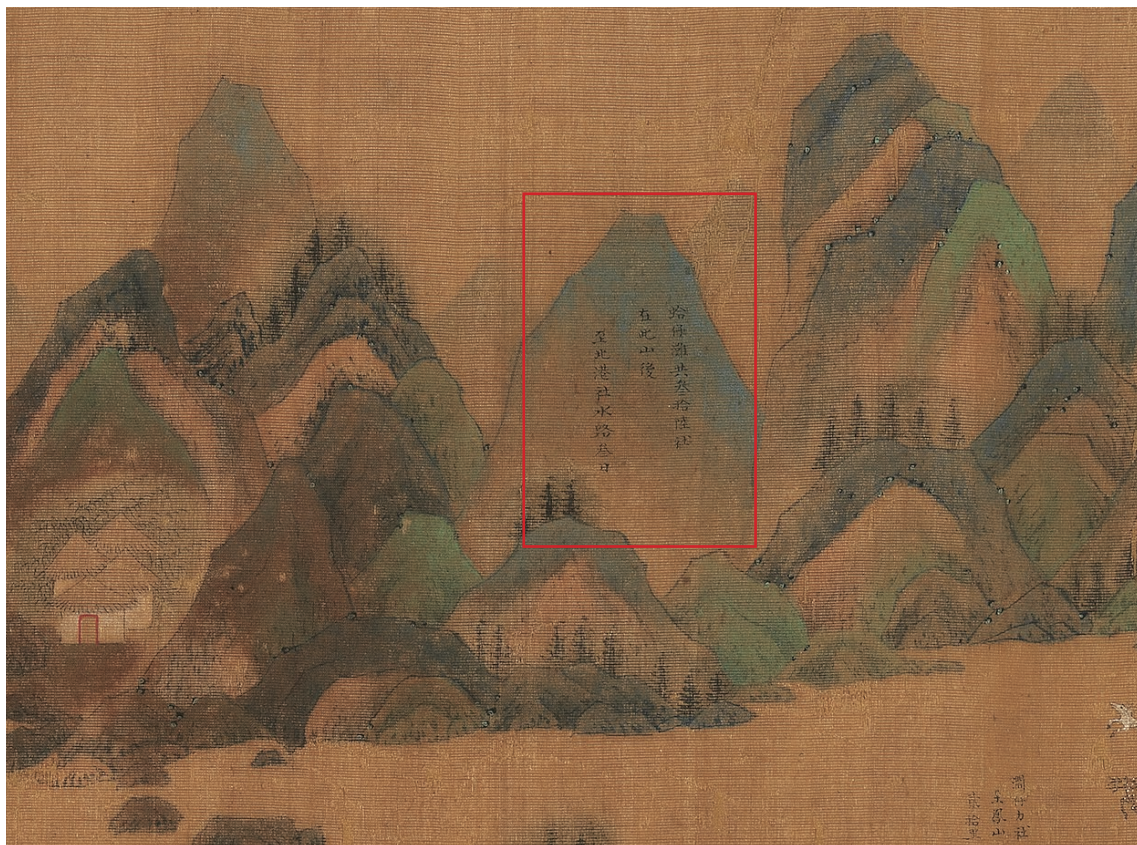


圖6 康熙31年至43年間 《康熙臺灣輿圖》中「蛤仔灘共參拾陸社在此山後」 《康熙臺灣輿圖》原件 國寶 ©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武蘭聚落在當時的噶瑪蘭族社名。⁵從「期班女懶」音譯名近似「Kibannoran」來看，〈番俗六考〉中的「蛤仔難三十六社」社名，應延續了荷蘭時期進行戶口調查的成果。自《臺海使槎錄》詳列「蛤仔難三十六社」社名後，其後有關蘭陽平原的相關記載也都詳列了噶瑪蘭族社名，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十八世紀中葉的〈乾隆臺灣地圖〉除了記載「哈仔蘭內有三十六社，漢人貿易由社船。南風入，北風起則回」，旁邊並詳列三十六社名，當中即包含「奇班女懶社」（圖7）。然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續修臺灣府志》則將「期班女懶」記為「奇班宇難」，可知兩種音譯的社名同時存在。

淇武蘭的出現

嘉慶十五年（1810）清廷正式將蘭陽平原納入版圖，十七年（1812）成立噶瑪蘭廳，將統治觸角伸向後山地區，蘭陽平原中的原住民面貌也逐漸浮現。道光年間在鄧傳安（1764-？）所著的《蠡測匯鈔》中，紀錄了他於道光三年至道光十年（1823-1830）在臺灣近十年的所見所聞，其中的〈臺灣番社紀略〉便提及「其淡水之蛤仔難，向在界外，今入版圖，改稱噶瑪蘭」，並說明「奇班宇難（即奇蘭武蘭）」，可知乾隆年間的「奇班宇難」，即為道光年間的「奇蘭武蘭」。噶瑪蘭廳設立的隔年，臺灣鎮總兵武隆阿（1776-1831）認為原先三十六社



圖7 18世紀中葉（清乾隆中期） 乾隆臺灣地圖 局部 圖中提及「奇班女懶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

的音譯社名不夠文雅，便全部加以改正，「奇蘭武蘭」即是在此一譯正社名下的結果。道光九年（1829）姚瑩（1785-1853）所撰的《東槎紀略》中，更明確將此三十六社以蘭陽溪為界作區分，以北為西勢、以南為東勢，說明「噶瑪蘭番社，東勢一十六社，西勢二十社」，奇蘭武蘭社即位於蘭陽溪以北的西勢。而在《東槎紀略》卷二提到的：「今卑職將噶瑪蘭全境通盤籌畫，應分為七保：西勢、頭圍抵美簡莊為第一保，四圍、淇武蘭莊為第二保……」⁶是淇武蘭名稱首次的出現。

從文獻可知，「淇武蘭」在當時是作為漢人的鄉莊名，而非原住民社名。嘉慶元年（1796）吳沙（1731-1798）採用「結首制」招募漢人大舉入墾蘭陽平原，其中「結」和「圍」為拓墾單位：結是基本單位，圍則是高於結的組織單位，具有明確空間範圍的結，隨著拓墾發展成為漢人的街庄範圍，淇武蘭莊即是此歷史背景下出現的一個漢人聚落。至道光三年（1823）噶瑪蘭通判呂志恆（1775-1832）為了清查戶口，便於蘭陽平原實施保甲制，分為七保，並將四圍、淇武蘭莊歸為第二保。刊行於咸豐二年（1852）由陳淑均（1831-?）編纂的《噶瑪蘭廳志》卷二〈規制志〉中「譯正西勢（即溪北）番社二十所」當中亦記載：

瑪立丁洛即麻支鎮落，廳北，下俱同、
新那罕即新仔罕、幾穆蠻即奇武暖、
美都美即抵美抵美、達普達普即踏踏、
打那岸即哆囉岸、貓乳即馬麟社、熨
魯蘭即奇蘭武蘭：八社屬淇武蘭堡。⁷

除了記錄了噶瑪蘭三十六社譯正前後的社名，如「熨魯蘭即奇蘭武蘭」，「熨魯蘭」為土音社名，「奇蘭武蘭」則為譯正社名，並說明各社所屬地方區劃的堡別，而包含奇蘭武蘭社在

內的八社即屬於「淇武蘭堡」。由於漢人聚落的快速增加，溪北由結組成的圍，成為官方劃分地域單位的堡界基礎，加上漢人不斷買墾、墾墾，侵墾番社土地，到了道光末年，便在番社附近建立眾多的漢莊，如《噶瑪蘭廳志》卷二記載：「新店距城北二里、大破口北五里……淇武蘭民莊北十六里……飽靴崙西北八里：以上淇武蘭堡。」包含淇武蘭民莊在內的幾個漢莊，皆被列入淇武蘭堡。而位於溪北的二十所西勢番社也被劃入淇武蘭堡的範圍，除了呼應了文獻中提到西勢番社已與漢人雜處的情況，從淇武蘭堡包含淇武蘭民莊及奇蘭武蘭社的情況來看，淇武蘭的命名可能與其位置接近奇蘭武蘭社有關。

隨著漢人的拓墾發展，噶瑪蘭人的生活空間被壓榨，至清光緒十二年（1886）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1836-1896）在臺實施「清賦」的地稅改革，於蘭陽平原進行土地清丈紀錄時，人口數及土地縮減的番社更被使用舊社名來命名的漢莊名取代，如奇蘭武蘭即改為「淇武蘭庄」，所謂的「蛤仔難三十六社」，到清末由於人口外流嚴重，大部分也已經名存實亡。雖然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先後在蘭陽平原從事調查的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1857-1928）、總督府雇員伊能嘉矩（1867-1925）等，皆能找到三十六社大部分的分佈地、各社的頭目及後裔的戶數和人口數，如自明治二十九年（1896），伊能嘉矩前往宜蘭調查當地平埔蕃社的期間，在其〈宜蘭地方平埔蕃社一覽表〉記錄了蕃社名「奇武蘭社：Kivuran」。⁸但由於「蛤仔難三十六社」人口已大量流失，在十九世紀末伊能嘉矩手繪的宜蘭地圖中，也改以「淇武蘭社」命名（圖8）。至明治三十三年（1900）在蘭陽平原實施土地調查及規劃查定區域重新調整街



圖 8 19 世紀末 伊能嘉矩手稿 《宜蘭地圖》中的「淇武蘭社」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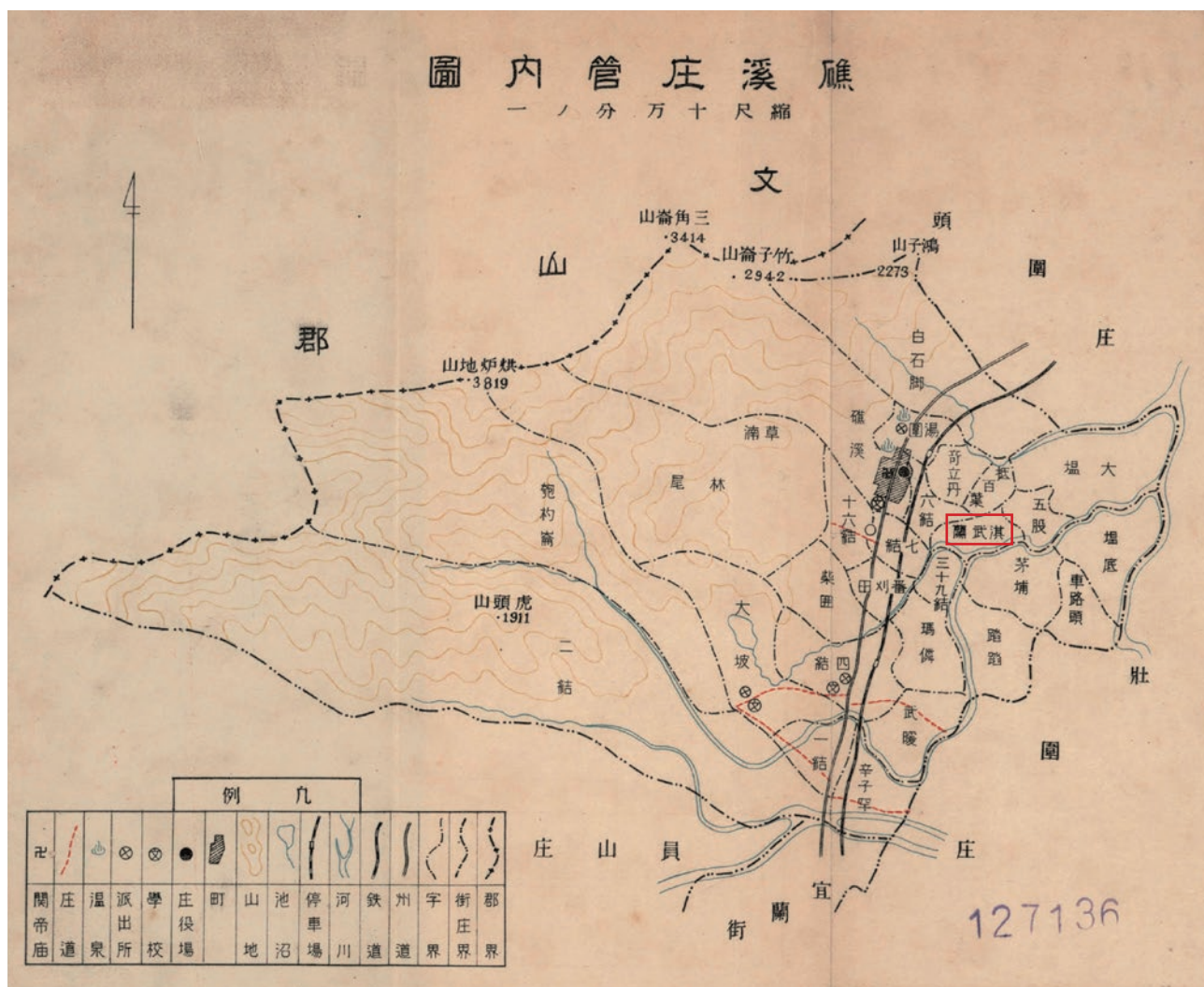


圖 9 昭和 8 年刊行 《礁溪庄勢一覽》〈礁溪庄管內圖〉中的「淇武蘭」 取自野口子之吉，《礁溪庄勢一覽》，礁溪：礁溪庄役場，1933-1934，頁 1。

庄社時，甚至已完全放棄以原住民的社作為查定區域的空間單位，皆改用漢人的街庄名指稱，曾經活躍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及其所建立的「三十六社」，自此之後更完全退出基層行政空間，⁹如包含奇蘭武蘭社在內的地區，到了昭和八年（1933）刊行《礁溪庄勢一覽》的〈礁溪庄管內圖〉中（圖9），亦僅以大字的街庄名「淇武蘭」標記此區域，¹⁰原作為漢莊名的淇武蘭便沿用至今，取代了曾經活躍於此地的噶瑪蘭族社名，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淇武蘭的由來。

漢人移民社會與外來陶瓷

透過文獻的記載，我們得以瞭解「淇武蘭」名詞的出現，實為漢人移民社會的產物，而在這樣的時空脈絡下，也為淇武蘭遺址帶來了許多外來陶瓷。淇武蘭遺址中，出土的外來陶瓷共有 30,936 件，種類包含碗、盤、碟、瓶、壺、火爐、鉢、盆、缸、杯、罐、匙、燭臺、鴉片煙具等器型。這些外來陶瓷，主要產地來自中國，個別標本來自東南亞的泰國、緬甸或是東亞的日本，年代橫跨從十六至十九世紀，而淇武蘭遺址外來陶瓷大量出現的時期，剛好就位於北臺灣對外貿易的兩個高峰——十七、十九世紀。

關於淇武蘭遺址於第一波高峰帶來的外來陶瓷，學者多有論述，如謝明良教授已清楚梳理了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其中包含了中國景德鎮的製品，如外壁繪纏枝靈芝紋的青花敞口小碗、內底繪江濱垂釣的圈足盤，以及器外壁施褐色紫金釉並於內壁繪青花的巴達維亞瓷（Batavia Ware），時間涵跨最早從十五世紀晚期到十八世紀初期（圖 10-1）。另外還有大量福建及廣東地區的製品，種類有青花、青瓷、五彩和低溫鉛釉陶器等，以及零星來自泰國的陶罐（圖 10-2、10-3）。十六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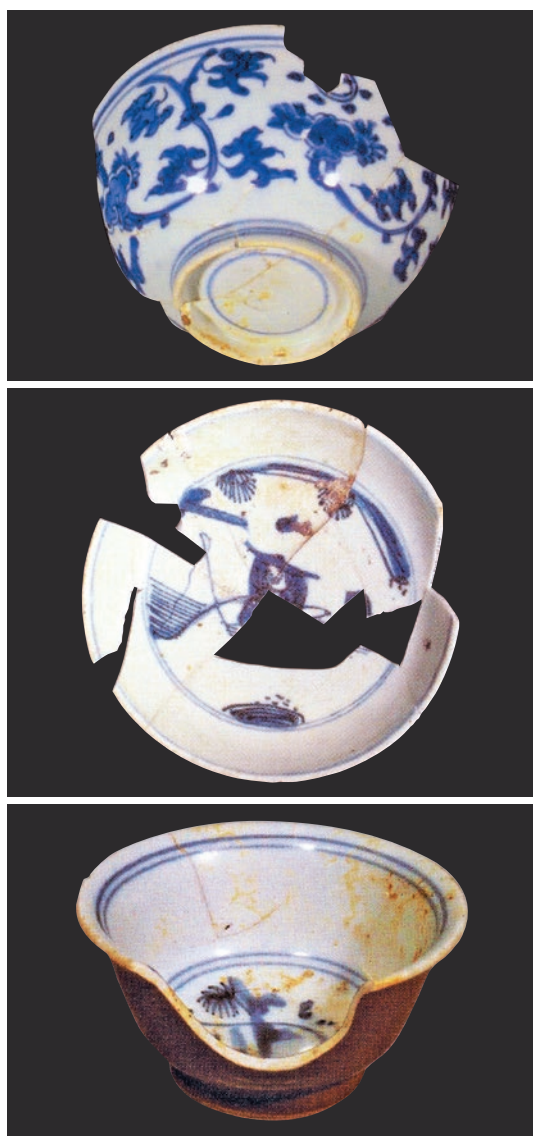


圖 10-1 16至17世紀 中國景德鎮陶瓷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175、182、193。

紀下半葉開始，隨著中國明朝、西班牙、日本角逐東亞商業貿易，促使臺灣的雞籠、淡水晉升為東亞區域間貿易與戰略的重要據點。十七世紀初期臺灣北港（大員）興起，貿易重心一度南移，至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臺灣南北進入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西班牙帝國對抗的



圖 10-2 16 至 17 世紀 中國福建、廣東地區陶瓷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4》，頁 154、186、192、194、197、207。



圖 10-3 16 至 17 世紀 泰國陶罐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4》，頁 208。

環節，北臺灣的貿易因而得以維持並達於鼎盛，此時輸往噶瑪蘭地區的外來陶瓷，即是上述動態發展的區間貿易的後續支流之一。¹¹

十八世紀以後，中國沿海渡海來臺的移民日多，但清廷渡臺政策嚴厲，直到光緒元年（1875）才解除各種禁令，並開始廣設招墾局招募開墾者來臺墾荒。而蘭陽平原自十九世紀漳、泉、粵三籍漢人移民大舉入墾之後，期間發生多次分籍械鬥，多次械鬥的結果是溪北，也就是淇武蘭聚落位於的西勢，幾乎為漳州人所佔有，故此時淇武蘭聚落的日用陶瓷器，無論運銷或消費模式，皆是以漢人為中心。但由於臺灣地區窯業發展較遲，十九世紀前期的日用陶瓷仍須仰賴中國沿海漳、泉地區的供給，¹² 如

《噶瑪蘭志略》卷十一〈風俗志〉「商賈」中描述：

蘭中惟出稻穀，次則白苧，其餘食貨百物，多取於漳、泉。絲羅綾緞則取資於江浙。每春夏間南風盛發，兩晝夜舟可抵四明、鎮海、乍浦、松江，惟售番錫，不裝回貨。至末幫近冬，北風將起，始到蘇州裝載綢疋、羊皮諸貨，率以為常。一年只一、二次到漳、泉，亦必先探望價值，兼運白苧，方肯西渡。其漳、泉來貨，飲食則乾果、麥、豆，雜具則磁器、金楮，名「輕船貨」。¹³

可知十九世紀上半葉蘭陽平原的食貨百物多取

於漳、泉地區，直接往來的船隻中，包含往來漳州、泉州，多載運蘭陽平原生產的白苧西渡，回航所載的貨物則包含乾果、麥、豆、金楮等物以及瓷器。因此在淇武蘭遺址，可以發現大量來自中國福建地區，如德化、永春、安溪、華安、南靖等地產燒的青花瓷，包含典型的靈芝紋、圈點紋與山石花卉紋等，福建漳州東溪窯的青瓷、白瓷（圖 11-1），以及福建、廣東地區的褐釉瓷等等，器形涵蓋了各種日用器皿，如盤、碗、湯匙、小碟、罐、香爐、燭臺、油燈等（圖 11-2），達到淇武蘭遺址外來陶瓷的第二波高峰。這些十九世紀外來陶瓷的出現，除了



圖 11-1 19 世紀 中國福建地區青花瓷、白瓷與青瓷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4》，頁 159、162、181、185、194、197。



圖 11-2 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地區的各式日用陶瓷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4》，頁 187、221、222、228、231。

反映漢人移民社會的需求，為漳州人所佔據的淇武蘭聚落，其出土的外來陶瓷組合或許也反映了漳州人原鄉的日常生活模式與喜好。

淇武蘭的貿易網絡與文化轉變

因應移民社會漢人需求的歷史轉變下，臺灣也由國際性東亞區間貿易的支流，轉成國內港口貿易系統下的一環，位於噶瑪蘭海岸北端的烏石港，在漢人入墾後便很快成為噶瑪蘭地區最重要的港口，並於道光六年（1826）成為「正口」的合法通商口岸（圖 12）。¹⁴有趣的是，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外來陶瓷，在古笨港遺址也可以發現相似的產品（圖 13）。此時的古笨港地區，與淇武蘭聚落一樣為中國閩南地區漢人

移民為主的社會，遺址的各種物質文化遺存，同樣也反映了清代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性質。而古笨港作為十八世紀以後臺灣中南部沿海的重要港市與口岸，除了供應本地居民所需，同時也可能成為外來瓷器的分銷集散地。¹⁵如《東槎紀略》卷二提到：

噶瑪蘭西勢烏石港、東勢加禮遠港，二處小口，向於春末夏初南風當令之時，有臺屬之鹿港、大按、八里坌、雞籠等處小船，載民間日用貨物，進港貿易，併有內地之祥芝、獺窟、永寧、深滬等澳採捕漁舟入口，售賣鹽魚、魚脯，換載食米回內。¹⁶

除了中國華南沿海商民往往於春末夏初南風司



圖 12 咸豐 2 年《噶瑪蘭廳志》〈噶瑪蘭廳地輿全圖〉中的烏石港 取自陳淑均撰，李祺生續輯，《噶瑪蘭廳志》，頁 2。

令時載運日用貨物至烏石港貿易，臺灣西岸的鹿港、大安、八里坌等港也同樣會載運百貨前往烏石港貿易，而位於溪北至烏石港之間的淇武蘭聚落，便有可能通過此一途徑取得外來的日用陶瓷器，為淇武蘭遺址外來陶瓷輸入的管道提供更多面向的可能性。而十九世紀的移民風潮，也包含東南亞地區的華僑，這些海外華僑的飲食起居仍是保持中國傳統，所需物品亦是仰賴中國出口，故在道光二年（1822）從廈門港出發，航向爪哇（今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海峽，途中不幸觸礁沉沒的「泰興號（Teek Seeun）」貿易商船當中，也可以見到與淇武蘭遺址出土同樣的十九世紀外來陶瓷（圖 14）。其中較大的差別，在於淇武蘭遺址僅見零星的紫砂器，一件為多彩紫砂胎壺，另一



圖 13 古笨港遺址出土與淇武蘭遺址同類外來陶瓷

(a - d) 取自何傳坤、劉克弘、陳浩維，《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考古試掘報告》，嘉義：新港文教基金會，1999，頁 144、145、148、153。

(e、f) 取自盧泰康、堀內秀樹主編，川愛實譯，《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2·研究編》，雲林：雲林縣政府，2023，頁 96；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9 期，2017 年 3 月，頁 50。



圖 14 道光 2 年 泰興號 (Teek Seeun) 沉船出水與淇武蘭遺址同類陶瓷 取自 Pickford, Nigel, and Michael Hatcher.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hina's Titanic: its tragedy and its treasure* (Cambridge: Granta Editions, 2000), 139, 140, 143; Auctions, Nagel.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183, 193, 244, 290, 313.



圖 15-1 中國江蘇宜興紫砂壺 古笨港地區出土 取自盧泰康、堀內秀樹主編，川愛實譯，《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1·遺物編》，雲林：雲林縣政府，2023，頁 16。



圖 15-2 泰興號 (Teek Seeun) 沉船出水的各式紫砂壺 取自 Auctions, Nagel. Tek Sing treasures, 277.



圖 16-1 東南亞地區發現的 19 至 20 世紀中國福建地區青花瓷 荷蘭私人收藏 取自 Harrison, Barbara. *Later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8,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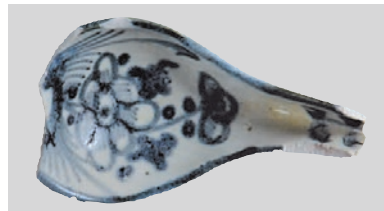


圖 16-2 西沙群島出水 19 世紀中國福建地區青花瓷 取自西沙群島 2018 年水下考古隊，〈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 2018 年水下考古調查簡報〉，《水下考古》，2020 年 2 輯，頁 25、26。

件為鴉片煙具；¹⁷ 古笨港遺址和泰興號沉船則有數量不少的江蘇宜興紫砂壺（圖 15-1、15-2），反映因應不同地區移民漢人的原鄉生活喜好，可能帶來不同組合模式的外來陶瓷。在東南亞地區及其他前往東南亞貿易的沉船遺跡中，也可以見到類似的外銷陶瓷（圖 16-1、16-2）。因此，十九世紀淇武蘭聚落外來陶瓷的大量出

現，除了彰顯清代臺灣漢人移民的社會性質，也應證臺灣為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海外華人移民社會與中國外銷市場開始轉向南洋貿易時空背景下的其中一環。

而漢人移民帶來的大量外來陶瓷，也影響了淇武蘭聚落原住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從噶瑪蘭本地自製幾何印紋陶的減少，暗示了因應外來陶



圖 17 宜蘭淇武蘭遺址墓葬中的安平壺及青花玉壺春瓶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4》，頁 155、186。



圖 18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瑪瑙珠 取自陳有貝，《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頁 32。

瓷的進入，逐漸接受漢人的生產、語言及衣食方式，《噶瑪蘭廳志》中也提到自漢人入蘭拓墾以來，西勢各社已「漸通漢人語言，亦知愛重銀錢，烹調飲食矣。」此外，在淇武蘭遺址的墓葬中，亦常見外來陶瓷作為隨葬品，如安平壺、青花玉壺春瓶、白瓷盤口瓶、青釉瓶、白瓷罐、瓷碗、瓷碟、硬陶罐及軍持等器類（圖 17），其中僅部份與生活面出土器物重疊，表示淇武蘭聚落原住民是有意識地選擇特定種類的外來陶瓷作為陪葬品，這些外來陶瓷不單只是生活器皿，更可能是彰顯身分與地位的象徵。¹⁸ 至於淇武蘭聚落的噶瑪蘭原住民是如何取得這些外來陶瓷，詳細的物品流通方式雖無法有明確的材料說明，但從嘉慶十三年（1808）三月十二日，由福州將軍賽冲阿（?-1828）〈奏報查明臺灣內山蛤仔爛番埔開墾情形〉摺奏請的記載：

今蛤仔爛生番三十六社，除打馬烟等

十社依水傍山，與居民隔絕，毋庸議外，其餘奇蘭武蘭等二十六社，或民屯錯處、或貿易相通，當洋匪竄泊之時，能知大義，為官出力，已與熟番無異，自應照熟番之例，酌設屯弁，以資約束。¹⁹

可知此時包含奇蘭武蘭社在內的二十六社，除了已與漢人雜處，甚至還有貿易的往來。那麼這些番社是如何與漢人進行貿易？有學者推測在淇武蘭遺址出的大量瑪瑙珠（圖 18），除了作為裝飾品，可能也用來買賣貨物，似乎同時具有實物價值及部分貨幣功能。²⁰

結語

位處蘭陽平原北部頂點的淇武蘭聚落，在漢人的入墾路線下首當其衝，短短十數年間，這些噶瑪蘭人的生存空間被剝奪，開始在平原

上流離遷移。曾經在荷蘭時期人口數最多的淇武蘭原住民聚落，到了十九世紀已不到百位，甚至原有的噶瑪蘭社名也為漢人開墾而建的漢莊名取代。然而透過考古遺址的發掘及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重新拼湊史前淇武蘭聚落裡噶瑪蘭原住民的生活軌跡及其聚落的發展與變化。淇武蘭這個名詞的出現，除了代表了漢人

移民社會的時空背景，在此一脈絡下出土的大量外來陶瓷，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是臺灣平埔族群文化轉型的關鍵證據，更是理解臺灣在十九世紀融入區域貿易體系的重要材料。這些器物不只是古代的生活痕跡，更是跨文化交流的載體，承載著族群互動、經濟網絡與社會變遷的歷史故事。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宜蘭博物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yilan_collectionsweb/search.aspx（檢索日期：2025年9月30日）。
2. 陳淑華，〈噶瑪蘭族〉（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6），頁48。
3. 陳有貝，〈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新北：華藝數位，2020），頁58。
4. 詹素娟，〈平原之人——噶瑪蘭的前世與今生〉，《故宮文物月刊》，370期（2014.1），頁32。
5. 詹素娟，〈番俗六考：十八世紀清帝國的臺灣原住民調查紀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21），頁313，蛤仔難三十六社對照表。
6. （清）姚瑩撰，〈東槎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29年原刊），頁65。
7. （清）陳淑均撰，李祺生續輯，〈噶瑪蘭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52年原刊），頁30。
8. 伊能嘉矩，〈宜蘭方面に於ける平埔蕃族の實査・臺灣通信（第二十三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卷147號（明治31年6月28日，東京：東京人類學會，1898），頁346。
9.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30-31。
10.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1895-1945），在臺灣的土地建立了一套大小字（街庄和土名）地理空間單位系統，並以此系統管理臺灣土地、人民和社會。施添福，〈臺灣堡圖：日本治臺的基本圖〉，《臺灣堡圖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前頁導讀。
11. 謝明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0期，（2011.3），頁83-144；謝艾倫，〈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57-64。
12. （民國）連橫《臺灣通史》提到：「臺灣陶製之工，尚未大興，盤盃碗之屬，多來自漳、泉，其佳者則由景德鎮。」可知十九世紀上半葉臺灣所需的日用陶瓷仍須中國沿海漳、泉地區或景德鎮供給。連橫，《臺灣通史》，卷26，〈工藝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47），頁438。
13. （清）柯培元撰，夏德儀編輯，〈噶瑪蘭志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9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835年原刊），頁116。
14. 謝艾倫，〈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頁62。
15. 盧泰康、邱鴻霖著，《古笨港的歷史考古學研究》（雲林：雲林縣政府，2020），頁285-288。
16. （清）姚瑩撰，〈東槎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頁60。
17. 該船過去被稱為「的惺號」（Tek Sing），據陳國棟考訂，英文名應為「Teek Seeun」，中文名或為「得順」、「德順」。因相關研究多用「泰興號」，故本文以「泰興號」稱之。見陳國棟，〈關於所謂「的惺號」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見〉，《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二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21-44；謝艾倫，〈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的外來陶瓷：一個歷史考古學的研究〉，《考古人類學刊》，76期（2012.6），頁54。
18. 謝艾倫，〈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頁61。
19. 賴玉玲，〈清代臺灣的展拓拓土（1722-1874）〉，《故宮文物月刊》，462期（2021.9），頁61；賽冲阿，〈宮中檔奏摺——嘉慶朝〉，〈奏報查明臺灣內山蛤仔欄番埔開墾情形〉，故宮 096034。《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5537793D0ajRCM#e1F>（檢索日期：2025年11月25日）。
20. 陳有貝，〈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頁197-198。